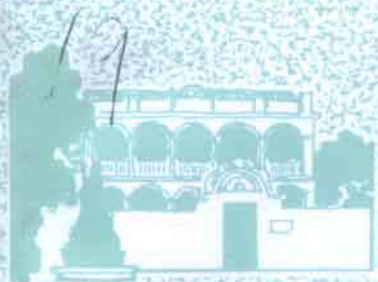


廣東文史資料

7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七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粤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吴春泉

封面设计：黄定成

封面题字：林雅杰

责任技编：陈垂涛

2B14/67

广东文史资料

第七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厂址：广州市永福路44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5印张 197,000字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册

ISBN7—218—01421—6/K·319

定价7.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革命一生的李伯球同志

-郭翹然 李洁之 胡一声 (1)
- 难忘战友情.....陈残云 (7)
- 风雨同舟话当年
-孙大光 卓 炯 何思贤 杨康华 (12)
- 一片丹心为人民郭 岳 陈宏文 (16)
- 岭南视听改革前进的轨迹.....方 亢 (35)
- 当代广东的农垦事业.....孙映豪 (63)
- 粤海关从帝国主义手中回归人民.....潘启后 (99)
- 我所知道的义益行.....陈 镌 (105)
- 华侨“救报”功不可没.....陈夏苏 (112)
- 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李清泳 (116)
- 爱国华侨谢易初传略邱 健 袁伟镗 (121)
- 当代泰华名人谢慧如.....张映秋 (132)
- 赤子精诚 情系乡邦.....郑仁章 (142)
- 一门忠烈的爱国华工领袖黄一飞.....顾 言 (150)
- 我在印尼的经历和见闻.....陈鸣高 (158)
- 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华人社会.....杨启光 (166)

香港捷和制造厂发迹史.....	杨贻书 (183)
日本广东同乡会馆今昔.....	罗晃潮 (187)
二战期间的香港间谍战.....	谢永光 (195)
广东畚族风情.....	莫祖喜 (210)
粤海道尹王典章巡行日记 (续)	(218)

革命一生的李伯球同志

郭翹然 李洁之 胡一声

编者按：今年是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李伯球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本会特发表缅怀李伯球同志的回忆录三篇，以志纪念。

李伯球同志是一位坦率诚挚、热情开朗的益友，又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敢于为坚持原则而战斗的坚强战士。他的一生，正如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在伯球同志追悼会的悼词中指出的：“李伯球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五十多年来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伯球同志的革命历程，不是平坦的，而是在曲折崎岖、艰难险阻中前进的。

当1930年他在钦县县府工作时，他就已显露了绝不与旧势力妥协的锋芒。当时，他既极端痛恨同僚中的贪污腐化分子之所为，更不惧当地封建堡垒“宾兴馆”地主恶霸集团的威胁。他始终以人民之忧为忧，以建立廉明政治为己任。尽管一帮社鼠城狐攻击他的做法是“莫斯科的做法”，亦毫不动摇。有一天，他和郭翹然联袂郊游，并拍了一张背水而立的合影。后来伯球在这张照片上题词曰：“退一步便是深渊。”意指前进则生，倒退则亡。此意伯球出之于笔，见之于行，终其生不渝。

1931年5月，伯球和郭翹然由钦县回来广州以后，便即组

织“矛盾图书社”，作为宣传民主，联系青年的阵地。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伯球立即投身救亡运动出版刊物，大力宣传团结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初则刊行《青春》，继则出版《民族阵线》。当时，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郭冠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南方特派员，负责发展南方组织。伯球和郭翹然、张育康均在郭的介绍下参加了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组织。这是伯球同志参加革命组织活动的起点。1935年初，伯球赴日本留学。及后在中共《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伯球由日本弃学回国，参加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恢复组织，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伯球同志被推为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积极从事抗日民主革命运动。

“西安事变”后，由伯球主编出版《南针》。在《南针》的创刊号上，他就理直气壮地刊出了中国共产党发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大政治纲领》。《南针》被封后，又继之以《抗战农村》，进一步为“逼蒋抗日”大造舆论。当时给《南针》与《抗战农村》以财力支持者，为李洁之等同志；为之撰稿者有中共地下党员叶兆南（孙大光）、杨康华、饶彰风、卓炯、何希齐等同志。其间还陆续发表了中共的宣传文件。这就使上述刊物，能在中共的报刊还未能在广州公开发行的时候，传播了中共的声音，带给人民以希望。

伯球于出版刊物的同时，还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为革命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七七”抗战军兴后，伯球曾在广州建立了“抗战教育实践社”、“抗战青年团”以及郊区的“乡村抗战服务团”等群众组织。广州沦陷时，伯球带领其中的百多名青年撤至粤北，有的参加前线部队的政工队，有的组成递步哨为前方部队传送文件。后

来递步哨的同志，由伏击日寇的军车发展为游击队，由司徒卫中任队长，转入番（禺）、增（城）、龙（门）、从（化）一带开展游击斗争，多次予敌人重创。这批力量，在解放战争年代，又派梅日新同志，将之集结起来，在中共领导下，再度组成游击队，一直战斗到解放。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抗日统一战线濒于破裂。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把抗战进行到底，周恩来同志及时向各民主党派提出联合起来的建议。4月1日，“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便在重庆成立，并派梁漱溟等在香港出版《光明报》，宣传和平民主抗战到底运动。伯球在廖承志同志授意下前往参加工作。香港沦陷后，伯球同柳亚子等回到桂林，在中共领导下，从事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为内容的斗争。

1943年7月，伯球应电邀到重庆。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指示伯球返两广建立民盟组织，发展民主运动。伯球回到桂林，在粉碎了托派分子杜畏之向民盟内施展其挑拨离间，破坏党盟关系的阴谋后，建立了以梁漱溟为首，有张文、曾伟、周鲸文、千家驹等参加的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接着又在韶关建立了以李章达为首，有胡一声、杨逸棠、郭翹然等参加的民盟韶关核心小组。并分别在当地开创了民主运动的局面。

1944年底，桂林、韶关先后沦陷。为了发展国统区的统战工作，伯球在东纵的授意和帮助下，派出得力干部接李章达转移到梅县主持建立民盟东南干部会议的筹备工作。东纵派胡一声同志参加领导工作。1945年春节在梅县城东之潮塘伯球家乡举行第一次会议。李章达被选为主任委员，丘哲、张文、李伯球、胡一声、郭翹然、杨逸棠、钟介民、陈启昌、陈柏麟等被选为委员，伯球兼任组委会主任委员。并决定以潮塘为民盟

东南干部会议的机关所在地。会后，梅县地区的民主运动和统战工作得到迅速发展。在此之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惠阳县大鹏湾组成了一支武装队伍，主要负责人有张平等同志，伯球还派李义容、李世浩、陈晓凡等前往参加配合东纵作战（后来这支队伍并入东纵）。在民盟东南会议后的同年3、4月间，国民党反动派竟下令逮捕伯球同志。事为郭翹然等得悉，立即转由李丹飞告伯球。伯球夜走梅南胡一声家，转赴东纵，才免遭毒手。当时曾生、林平等同志为进一步发展南方民主运动，要伯球、陈残云同志往广西梧州大坡山找李济深商量，于是伯球和陈残云便冒着生命危险，偷越日寇封锁线，进入广州转赴大坡山，这里要补充一段，就是当伯球为免遭逮捕而出走梅南时，曾匆匆写就一封《告梅属父老书》，在他走后秘密散发。书中痛斥蒋介石失地千里、民不聊生、大肆屠杀进步人士的独夫民贼的行径，使当地国民党内部大为震动。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伯球与残云、周钢鸣和大批进步人士，于当年11月间由梧州李济深家回到广州。李章达、郭翹然、丘克辉等则由梅县来到广州相会。伯球旋又赴港，在中央驻港负责同志的支持下，为民盟和农工租下房屋，积极投入在港成立民盟南方总支部的筹备工作。1946年1月1日，民盟南方总支部在港宣告成立，伯球当选为委员兼组织部长。

与此同时，伯球与丘哲等，在港筹备出版《人民报》。由于在人力物力等方面都得到了中共的帮助，《人民报》便在当年的3月1日在港以日报形式出版。《创刊词》明确表明《人民报》是以“促进中国真正民主政治之实现”为自己的首要奋斗目标，后因形势发展的需要，迁至广州出版三日刊，同《华商报》、《正报》等进步报刊一道，投入维护政协五项决议、反对内战、反对进攻东纵的斗争。到6月29日，《人民报》即被国民党反动

派封闭。

《人民报》被封后，伯球又在驻港中共负责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在港筹办以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为己任的“达德学院”。以丘哲为筹备主任，伯球为秘书长，并成立了以李济深为董事长，蔡廷锴、丘哲为副董事长的董事会。开学后，伯球还兼任该院教授，伯球不愧为一个不知疲倦的战士。

1947年秋，国民党南京政府，悍然宣布民盟、农工为非法组织，民盟、农工的中央领导同志连续转到香港。伯球和在香港活动的邓初民、沈志远等，积极参加筹备在港召开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盟史上光耀千秋的一页。

1949年春，伯球应邀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会议。从此时起，伯球就一直是全国人民政协委员，1984年又补选为常委。

华南解放后不久，伯球自京返广州，任省农林厅副厅长，并担任民盟南总、粤支、港九联席会议执行小组副组长，协助李章达同志处理南方盟务，为解放后的南方盟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52年春，伯球上调北京农工中央工作。1957年由于“左”的路线影响，伯球被错划为右派。直至1981年才得到改正。难得的是，伯球在身处逆境的二十多年，其热爱党、热爱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之感情，并未稍变。且保持前期好读书的习惯，照样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即使是在十年动乱，身心倍受摧残的情况下，也还是如此。并在此期间，写了数百首诗词，表达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忠诚。

1983年初，伯球奉调返穗任省政协副主席。年虽已老，且双耳失聪，但工作热情一如往昔，并望能假以岁月，多做点事。

去年，伯球卧病东病区，我们多次看他，初时他还坚信自己能早日康复，但不久因病情恶化，他已口不能言。一次，他紧紧握着翘然的手，泪涔涔下，这是他最后对我们说的无声的万语千言。

斯人逝矣！深幸宏图开展，万木争春，“七五”功成，期当不远。伯球同志应无憾矣！

（1987年稿）

难忘战友情

——回忆和李伯球同志相处的日子

陈残云

我所尊敬的朋友李伯球同志，他是一位一生爱国的革命的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50多年来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同战斗，是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在艰辛的岁月里，我们相识了，相处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共同经历的惊险而复杂的生活历程，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彼此之间的生命史上都写下了难忘的一页。

时间是1945年7月下旬，在罗浮山东江纵队的司令部里，从梅县接来一位年纪50上下的客人。我的老朋友李嘉人同志向我介绍：他就是李伯球。他是一位长者，年纪比我们大十来岁，戴着近视眼镜，神态安详，他住在我隔壁的房间。我也是东纵的客人，是从粤桂边境大坡山带着李济深先生的使命而来的。私下里，李嘉人告诉我，李伯球是农工民主党的领导者之一，要和我一同到李济深那里去。李济深是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在湘桂撤退中接受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树起民主抗日的大旗，与共产党合作，坚持敌后抗战。

我和李伯球一见如故。5年之前，我知道他曾在粤东的兴梅地区当过县长，是进步的县长；现在见了面，觉得他态度亲切，没有一点架子，和我很谈得来。那些天，我们没有事情

干，都在等待领导交待我们任务，因而有充裕的时间闲聊、散步，或到就近的墟市去观光。当时东江的形势很好，区域扩展了许多，武装队伍日益壮大，农村里显出一种安静平和的形势。这是华南解放区的黄金时代。我和伯球住在司令部里，颇有安全感，安心地阅读党的“七大”文件。

8月初，李嘉人给我们传达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说周恩来同志来了指示：成立华南民主联军，由李济深任司令，以东江纵队、珠江纵队为主力，团结其他武装力量，准备反攻广州。他要我们先回大坡山，将中央的指示告知李济深。李伯球听了传达，十分兴奋，赞赏这个英明的决策。

过了两天，东纵的领导同志林平、曾生、饶彰风、李嘉人和我们共进晚餐，表达了殷殷关怀之意。当晚，李嘉人约我单独见面，交给我一张小纸条，这是周恩来同志的电台呼号，要我带给李济深，以后的工作，李可以直接向周恩来同志请示。另外交给我一份东纵送给李济深的礼物。随后他说：“路上你好好照顾李伯球。你们先走，过几天我也去。”

我回到房间里，把电台密码收藏好，便到伯球房间，告诉他明天要动身，并把给李济深的礼物平分携带。在匪盗林立、汉奸横行的沦陷区里，携带那么多珍贵物品是很危险的，但李伯球泰然地把我分给他的贵重物品稳妥地收藏起来。我们都自觉能经得起考验。

第二天清晨，我们提着小皮包离开东纵司令部，跟着一位通讯员向农村走去。在一户农家住了一夜。第二天，那家农民的儿子象作买卖的样子，护送我们到石滩，乘搭广九夜行火车到广州去。

到了广州，青年农民径自走了，由我照料伯球。我是广州人，穿上流行的短打，广州的风土人情、街道、语言都很熟

悉，容易混过关；特别是我到东纵时，途经肇庆，搞了一张肇庆伪警察局职员通行证，有一块“老虎皮”可以为伯球作掩护。但伯球是客家人，广州话讲得不好，虽穿上香云纱唐装伪装商人，但装得不象，他戴着那副近视眼镜，倒象是知识分子，易露破绽。根据他的特点，我们商量好他自认是从化人，因为从化有客家村，我是广州人，我们的关系战前同是小学教师，现在他经商，我当了“公务员”。

商量好了以后，他住到一德路的新世界酒店，我住到中华路一间同乡的小米铺里。这时候，广州正遇上西江洪水暴涨，交通断绝，我们走不了，异常焦急。

到广州的第二天晚上，广州人心浮动，传说苏联出兵东北，物价狂涨。我探听到一条可走的路，去佛山转西南，再转肇庆，然后走路回大坡山。这是一条转折又难走的路。走不走？我去酒店与伯球商量。他主张走，任务紧，不能再拖下去。我同意他的意见。这之间，有人推门进来，高叫“检查”！进来的是两个穿黑胶绸短打的“密侦”，门外站着两个持枪的伪兵。

伯球的皮箱被检查，查到一包人参，被追问。他答得很镇定，与经商的身份相符，其后搜身，搜不到什么可疑的物品。伯球虽裤头缝内藏黄金，毫不变色。一个矮子便转而盘问。先问伯球是何处人，做什么生意，与我是什么关系，从何处来？伯球自如地答复。后来又问他由从化到广州，坐船还是乘车？他稍作迟疑，我即接上说：“坐船又乘车。”我估计这些小混蛋也不知道从化与广州的交通状况。

矮子趁势盘问我：“你来广州干什么？”我说“公干。”他看着我的伪“通行证”，审察又审察，似乎有些怀疑，便问：“什么公干？”我以严肃的口吻回答：“这不能告诉你。”矮子似乎要生气：“这里不是肇庆，我有权查问。”伯球以老成持重的语气调和

道：“都是自己人，别生气。”我说：“我是来和你们警察局联系的，还问什么？”矮子顿了顿，把伪“通行证”交还我，悻悻然地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向他点点头：“算我鲁莽了，对不起。”他无言地转身而去。沦陷区是弱肉强食的“捞家”世界，我懂得一点行情，顺利地摆脱了纠缠。

伯球住的是临街的房间。混蛋们走了以后，我凭着窗台往下望，望见酒店门口守着持枪的伪兵，知道全酒店受搜查，不是光搜我们，也安了心。但当此世态纷乱时节，留在广州终归是危险的，伯球决定，明天立即离去。

第二天早上，我们乘小轮船到了佛山，在酒店住了一夜，步行去西南镇，接着又是乘小轮，又是步行，几经曲折，才到达肇庆。我去伪察警局寻找给我写通行证的云局长（他是在李济深处工作的云应霖的同乡），但他已离开了察警局，什么原因离去，我不敢多问，转头就走。

当天我们住进肇庆一间最好的酒店，肇庆离都城并不远，都城郊外就是我们控制的地区了，由于洪水未退，我们仍无法抵达。虽然如此，我们心里却已有着回到家门前的安全感。

夜晚，肇庆突然出现灯火管制，紧密戒严。酒店一位中年店员，以友善的口气通知我们今晚不要上街。他说街上谣言四起，有说日本兵要进行大逮捕，有说日本兵要撤走，有说游击队要反攻，说得人心惶惶。的确，街上乌灯黑火，行人敛迹。什么声音都没有，肇庆成了一个死寂的恐怖世界。伯球很镇静，没有半点恐慌神色。我们和那位中年店员商量，如果有什么变化，请他立刻告知我们。他是本地人，消息灵通。他频频颌首，很乐意照料我们。

黑夜笼罩着天空，我们坐在房间里，等候不可知的事态来临，到底是喜是忧，难于预测，但我们心理上准备了最坏的变

化。我自己，已把周恩来同志电台密码的条子放在手帕里，万一遇上不幸就放进嘴里，吞下肚里去。

这是一个沉寂的恐惧之夜，不眠之夜。我们有时低低地说话，声音是坚定的。伯球始终镇静如一。伯球是经历丰富的人，冷静的人，有了他的指点，更增强了我应变的决心和勇气。

突然，一声鞭炮声，惊破了深夜的沉寂。接着是浪涛一般的鞭炮声，震撼着破旧的端州古镇。随之而来的是电灯亮了。街上人声鼎沸。欢庆日寇投降的欢呼声，冲进了我们的耳膜。伯球和我都欢声地叫了起来，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形势突如其来地发展，使党中央的指示也发生了变化。但我们更加急切地要赶回大坡山去，轮船不通，就从陆路走。翌日离开肇庆，绕道云浮、罗定，转到苍梧，经历了4天路程到达李济深的家。我们把党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同志的电台密码，以及东纵送的礼物全都交给了李济深，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在这艰辛而复杂的生活历程中，我和伯球结成了亲密的战友。在这以后的民主运动中，也共同作战过。他曾经是民盟南方总支部的组织部长，我是副部长，我们相处得很好。建国以盾不久，他到了北京，我一直留在南方，有时偶然相叙，感情倍加亲切。

几十年来相交的老朋友，一旦永别，使人黯然神伤，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在艰辛岁月中结下的情谊，哪怕是生命中的一瞬，也令人深切怀念

（1987年稿）

风雨同舟话当年

——纪念战友李伯球同志

孙大光 卓炯 何思贤 杨康华

50年前，我们在革命活动中先后和李伯球同志认识，为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奋斗，结下了肝胆相照的深厚情谊。回想当年风雨同舟的战斗历程，使我们倍加怀念这位坦率诚挚、不断追求进步的战友。

伯球出身贫苦，少年时期就外出谋生，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认识社会、追求真理。早年他在阅读梁启超、孙中山和陈独秀的著作中，爱国民主思想得到很大的启发。1925年在家乡梅县山村办夜校，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抗拒军阀摊派的军饷，初露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锋芒。随后，参加过北伐军做政治工作。“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经中山大学郭冠杰教授介绍，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惯称为“第三党”）。经过国内外风云变幻影响及研读革命理论，伯球逐步认识到，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从此，他坚决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至死不渝。

1935年，在民族危机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伯球在日本东京看到《“八一”宣言》和